

从三民主义到新民主主义： 抗战初期中共对三民主义理论的探讨*

左玉河

提要：从1938年底开始，国民党根据自身需要对三民主义进行再诠释，其目的既要与汪精卫争夺三民主义话语权及国民党之正统地位，更是为了以三民主义压迫中共放弃共产主义，从而引发国共两党关于三民主义问题的激烈争论。中共在论争中将三民主义区分为“真假三民主义”，阐明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内涵，并提出“新旧三民主义”概念，明确宣告自己“愿意为之彻底实现而奋斗”的三民主义是包括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为了摆脱国民党的“三民主义”话语，毛泽东用“新民主主义”一词指代“新三民主义”概念，构建了以“新民主主义”为核心概念的“新民主主义”话语体系及革命理论。

关键词：三民主义 三大政策 新三民主义 新民主主义

孙中山晚年确立的包括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内的新三民主义，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随着三民主义成为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官方意识形态，国民党内部对三民主义进行了多种阐释，三民主义逐渐丧失其革命性。为了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之初赞同以孙中山的革命之三民主义作为第二次国共合作之政治基础。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顽固派以此为借口，企图以自己阐释的所谓“三民主义”压迫中共放弃共产主义而全面接受国民党的领导，从而引发国共两党关于三民主义问题的争论。^①中共在论争中不仅阐释了自己所赞同的新三民主义之内涵，而且逐渐构建了一套关于“新民主主义”话语体系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一 中共对三民主义的赞同与三民主义话语权的争夺

全面抗战爆发前后，鉴于孙中山创立的三民主义在较长时期内是中国民主革命的政治符号，为了联合国民党以实现全民族抗战，中国共产党赞同以孙中山革命之三民主义作为国共合作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政治基础。毛泽东对此明确解释说：“只有全面的民族抗战才能彻底地战胜日寇。然而要实现全面的民族抗战，必须国民党政策有全部的和彻底的转变，必须全国上下共同实行一个彻底抗日的纲领，这就是根据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孙中山先生所手订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发展史研究”（项目编号：21AZS001）、国家社科基金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工程《中国抗日战争志》（项目编号：16KZD021）阶段性成果。

① 目前学界关于战时三民主义争论问题的研究成果，主要有蔡乐苏、曾静的《弹性的符号——抗战时期中共言说中的孙中山与三民主义》（《清华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程舒伟《抗战时期的国共关系与三民主义论战》（《沈阳工程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伍小涛《国、共、伪三方对三民主义政治符号的争夺》（《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李永进《抗战时期毛泽东对三民主义的话语重构》（《毛泽东思想研究》2018年第3期）、李后东《抗战时期国共三民主义论战与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构》（《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20年第1期）等，但仍有较大的研究空间。笔者拟从国共两党关于三民主义话语权之阐释与争夺的视角，探讨中共从新三民主义理论阐释转向新民主主义理论建构的内外机缘，揭示新民主主义理论建构的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

大政策的精神而提出的救国纲领。”^① 1937年7月15日，中国共产党在交付国民党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2日正式公布）中，依据革命的三民主义明确提出自己在抗战时期的奋斗目标为：“（一）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首先须切实的迅速的准备与发动民族革命抗战，以收复失地和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二）实现民权政治，召开国民大会，以制定宪法与规定救国方针。（三）实现中国人民之幸福与愉快的生活。首先须切实救济灾荒，安定民生，发展国防经济，解除人民痛苦，与改善人民生活。”这三项目标，实际上涵盖了三民主义的思想精髓。为了表明与国民党合作的诚意，中共中央在该《宣言》中向全国民众郑重表示：为解除一切善意怀疑者之误会，中共中央重申了四项保证，其中第一条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② 这项保证，实际上明确表明中共愿意在孙中山三民主义基础上与国民党实现第二次合作。由于中共的积极倡导和蒋介石的实际默认，三民主义遂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政治基础。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确定“三民主义暨总理遗教为一般抗战行动及建国之最高准绳”，表明三民主义既是国共合作之政治基础，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毛泽东和中共反复表达了赞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及“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的政治保证。1937年10月，毛泽东在与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中重申：“我们同意以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三大政策及其遗嘱，作为各党派各阶层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同时承认“国民党现在已经部分地实行了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这表现在实行了对日抗战”^③。次年3月20日，毛泽东在抗大讲话时指出：“三民主义的第一个口号是民族独立，第二个口号是民权自由，马克思主义与三民主义结合的地方就在这里。所以说今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是三民主义者。”^④ 5月3日，毛泽东在谈及中共对三民主义态度时强调：《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表明中共对三民主义的态度，即“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并再次表示：“中共愿同国民党一道，在统一战线、抗日第一的原则下实行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必经之路。”^⑤

由此可见，三民主义是国共两党团结御侮、合作抗日的政治基础，中国共产党明确表示赞同三民主义并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但中共赞同并“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的三民主义，是孙中山的革命之三民主义。对此，毛泽东和张闻天等中共领导人均作了明确阐述。张闻天指出：“我们共产党人不但愿意在抗日问题上，在实现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问题上，同国民党合作，而且愿意在实现孙中山先生的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上也同国民党合作。我们愿意同国民党共同建立民族独立、民权自由与民生幸福的民主共和国的新中国。”^⑥ 毛泽东明确指出：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将引导这个合作到争取全民族解放，其民权主义将引导这个合作到彻底的建立民主国家，其民生主义则可能引导这个合作到很长的时期，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与政治思想，保证着统一战线的长期性。正因如此，他强调：“我们所谓民主共和国就是三民主义共和国，它的性质

①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卷，第354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4册，第369页。

③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77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中卷，第57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66页。

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册，第747页。

是三民主义的。”^①由此可见，中共所赞同的三民主义是孙中山的革命之三民主义，而并非蒋介石后来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所阐释的三民主义。因孙中山的革命之三民主义与中共民主革命纲领基本一致，故中共在其领导的根据地坚持抗战到底，大力弘扬民族主义；积极建立三三制政权，实行民权主义；实行减租减息，将民生主义付诸实施，以实际行动忠实地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之实现而奋斗。

孙中山创建的革命之三民主义在较长时期内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政治符号，也是国民党各派及中国共产党均要加以争夺的思想遗产。随着汪精卫的叛逃及对三民主义的曲解，不仅国民党各派围绕三民主义话语权展开激烈争夺，而且国共两党也围绕三民主义之内涵展开了激烈论争。1938年12月19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出逃并公开发电主张“和平救国”。其所发《艳电》称：“三民主义为中华民国立国之最高原则，一切违背此最高原则之组织与宣传，吾人必自动的积极的加以制裁，以尽其维护中华民国之责任。”他还以三民主义附和日本的“共同防共”，并公开宣称：“中国共产党人既声明愿为三民主义之实现而奋斗，则应即彻底抛弃其组织及宣传，并取消其边区政府及军队之特殊组织，完全遵守中华民国之法律制度。”^②很显然，汪精卫不仅将自己打扮成国民党之正统代表者、国民政府之合法体现者及孙中山革命思想之合法继承者，而且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为其叛国投敌的护身符和反共的话语武器。汪精卫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曲解及对三民主义话语权之争夺，不仅遭到中共严厉批驳，而且受到国民党人的抵制。国民党中央开除汪精卫党籍并撤除其一切职务，并着力阐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以捍卫国民党之道统与法统地位。但国民党宣传阐释三民主义之主要目的，固然是要反汪，是要与汪精卫争夺三民主义之话语权和国民党之正统地位，但更主要的意图是要反共，是要以三民主义统一全国民众之思想，压迫中共彻底放弃共产主义，全面接受三民主义及国民党的统一领导。据蒋介石日记称：“共党祸乱成性，叛逆日著，明年惟对此为最大问题之一，倭寇实已不能再为深患矣。”^③1939年初，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谈到对共政策时强调，“今日对共党不用兵、不利用、严管教，应以为不二之律条”，“要以领导党的立场，纠正其错误，反对其妄为，指正其趋向。总之，应以保育的态度相待。久之，共产党必将融化于本党，始有其存在之余地”^④。国民党颁布的《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及其实施办法》规定国民精神改造之标准规范为：“（一）不违反国民革命最高原则之三民主义；（二）不鼓吹超越民族之理想与损害国家绝对性之言论；（三）不破坏军政军令及行政系统之统一；（四）不利用抗战形势以达成国家民族利益以外之任何企图。”^⑤这些规定显然主要是针对中共及其共产主义思想的。

国民党以孙中山革命事业继承者自居，打着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旗帜统一全国民众思想，自认为具有充足之依据。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前后期有较大的变化，尤其是其晚年发展的包括“三大政策”在内之新三民主义，体现其真正的革命性和进步性，而以孙中山事业自居的国民党人并未完全继承其这方面的内容，而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发挥其他方面的内容，这就出现了孙中山逝世后“三民主义”被国民党不同派别加以利用而作出不同解释的突出情况。国民党内部对三民主义的解释，既有蒋介石对三民主义的解释，还有胡汉民对三民主义的解释，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第633页。

② 黄美真、张云编：《汪伪政权资料选编：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74页。

③ 蒋介石：《蒋介石日记》（1938年12月31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

④ 王子壮：《王子壮日记》第5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第37页。

⑤ 《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及其实施办法》，《东方杂志》1939年第36卷第6号。

更有汪精卫对三民主义的解释；既有宋庆龄对三民主义的解释，还有李济深等人对三民主义的解释。因此，国民党在阐释三民主义时，必然加上自己的理解和需要进行发挥，遂使其内容、重点及性质有较大改变。这样，从1938年底开始，国民党内各派别根据自身需要对三民主义进行诠释，其中尤以蒋介石对三民主义之阐释最具代表性。

蒋介石出于维护一党专制及强化威权统治的现实需要，用了很大精力阐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引申孙中山思想中的消极方面，形成蒋介石自己的三民主义思想体系。1939年5月，蒋介石发表《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讲演，指出：“我最近研究三民主义，荟萃总理关于革命建国的各种方略和遗教，贯穿拟定起来一个《三民主义的体系及其实行程序表》，我认为这一张表，可以把三民主义的原理和内容，以及实现主义所必需的革命原动力，和革命方略，乃至达成最终目的所必经的国民革命程序，包括无遗，很清楚明白地摆在我们面前。”他之所以抓住三民主义的旗帜而极力鼓吹“一个主义”，主要是要利用这面旗帜统一全国民众思想，用三民主义对抗中共的共产主义和中间政派的自由主义。因此，蒋介石一方面宣传三民主义的优越性，认为“三民主义是最完美的主义”。他解释说：“民族主义本乎情，民权主义本于法，民生主义本乎理。我们以提高民族感情，求得民族独立，以确立法治为实行民权的基础，再以公平划一的条理调剂公私经济的盈虚，以解决民生问题，如此情、理、法三者皆能厘然得当，所以三民主义比其他主义完备，而且比其他主义伟大悠久，亦比其他任何主义容易实行，亦就在这里。”^①另一方面则对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进行猛烈攻击，认定它们均不适合中国国情。他说：“共产主义，他固是重视经济，近于民生主义，却不重视民族和民权主义，而且共产党人倡导民生，亦只重视一个阶级的利益，而不兼顾全民的利益。……惟有我们总理所创造的三民主义则不然。它以‘公’字为出发点，所以能涵盖一切，把各方面皆行均衡顾到，无丝毫偏颇之弊。”^②既然三民主义比共产主义更公正合理，共产主义就应该包容于三民主义中，中共自然应当放弃共产主义。故蒋介石阐释三民主义旨在以其歪曲的所谓三民主义替代中共信仰的共产主义，并以中共赞同三民主义为借口，压迫中共放弃共产主义而接受蒋介石所阐释的三民主义。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之初已经将自己所赞同的三民主义内涵及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之关系阐述清楚，但因国民党的宣传鼓动，抗日阵营中仍然有部分人士要求中共明确宣布放弃共产主义理论，完全改信三民主义。国家社会党负责人张君勱声言：“窃以为目前阶段中，先生等既努力于对外民族战争，不如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③叶青则断言：“中国是三民主义底世界。共产主义应该离开中国。”^④有人更劝告中共更改党名，永远放弃共产主义的主张。据毛泽东回忆：“不但蒋委员长来电报要我们改名称，中间派也劝我们改名称。像左舜生就说过，‘你们的纲领实在好，如果你们不叫共产党，我就加入。’前年七、八、九三个月的反共高潮中，我们有很多东西搞出去了。他们看到之后，非常高兴，说纲领很好，就是名字不好。”^⑤这些人对三民主义的解释尽管体现了不同的利益诉求，但都以服膺“三民主义”为由要求中共放弃共产主义信仰并取消独立的组织活动。

① 蒋介石：《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青年中国季刊》1939年创刊号。

② 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卷，第326、329、333页。

③ 张君勱：《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再生》1938年第110期。

④ 叶青：《怎样研究三民主义》，江西私立行健中学，1943年，第143页。

⑤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报告》，《中共党史资料》，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第48辑，第24页。

面对国民党顽固派及部分党外人士打着“三民主义”旗号而对共产主义的诘难，中国共产党亟须继续加强对三民主义的阐释，进而掌握三民主主义之话语权。1939年6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在思想斗争问题上，两年来，尤其是半年来，代表国民党写文章的人包括托派叶青等在内，发表了许多不但反对共产主义而且也是反对真三民主义的‘纷岐错杂的思想’，亦即假三民主义或中间三民主义的思想，应该加以严正的批驳。”^①这样，中国共产党人遂发表一系列理论文章，如张闻天的《拥护真三民主义反对假三民主义》、周恩来的《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提纲）》、王稼祥的《关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陈伯达的《论共产主义者对三民主义关系的几个问题》、吴黎平的《叶青的三民主义就是取消三民主义》、艾思奇的《关于三民主义的认识》等，继续阐发对三民主义问题的见解，坚决回击国民党的理论挑战，与国民党围绕三民主义政治遗产展开了激烈争论。

二 从真假三民主义到新旧三民主义：中共对三民主义内涵的新阐释

国民党以三民主义反对共产主义之主要依据，是抗战之初中国共产党“承认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的政治保证。故中共必须首先说明什么是“中国今日之必需”的三民主义及为什么在赞同三民主义之时还要坚持共产主义信仰。中共在论争中不仅将三民主义区分为真假三民主义，阐明了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内涵，而且提出了“新旧三民主义”概念，明确宣告自己“愿意为之彻底实现而奋斗”的三民主义是包括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内的“新三民主义”。

1939年4月，中共中央在《为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告全党同志书》中首次明确提出“真假”三民主义问题：“抗日战线中各党各派的任何人究竟信仰三民主义与否，不在其口头之自称，而在其行为之表现，只有言行相符，才可称为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必须广泛的动员全国同胞，切切实实的实行三民主义，揭穿汉奸汪精卫辈的假三民主义，为具体实施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真三民主义而斗争。”^②言行是否一致，是判断“真假”三民主义之基本依据。此处所谓“假三民主义”主要指汪精卫所鼓吹的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是中共所主张的三民主义。随后，中共将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顽固分子歪曲解释的三民主义也纳入“假三民主义”之中：“力争以革命的言行相符的真正三民主义去对抗曲解的与言不顾行的假三民主义，以真正三民主义的姿态，去反对假三民主义者，即顽固分子。”^③

中国共产党人从不同角度对“真假三民主义”及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作了论述。张闻天强调，要“真正的拥护三民主义”，就必须严格分别孙中山的真三民主义与汪精卫的伪三民主义，必须在实际行动上实行三民主义，必须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他阐述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时说：“马列主义的立场，不但不妨碍我们在现阶段革命中拥护真三民主义，而且正是使我们所以能够拥护真三民主义的基本原因。”^④周恩来则提出：“真正的三民主义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既不是汪精卫的伪三民主义，也不是戴季陶的修正三民主义，当然也不能是我们某些同志企图马克思主义化的三民主义，因为这只能使三民主义混乱起来，而不能还它真正的革命面目。”中共的态度“应该赞助真正了解和实行孙中山真正的革命之三民主义的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卷，第120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6册，第184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6册，第306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6册，第549页。

人去发展三民主义，同时我们自己也应将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政策实行和发展起来，使它能与我们的民族解放政纲配合起来前进”^①。

毛泽东在1939年12月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明确提出“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两个新概念，从而将三民主义区分为“旧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并申明自己所赞同的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宣言和遗嘱中对三民主义重新诠释后的革命之三民主义，是包括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内的新三民主义：“即是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即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政策的三民主义。”他强调：“在新的国际国内条件下，离开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就不是革命的三民主义。”^②这样，就把“三大政策”与“三民主义”结合起来，将是否包含“三大政策”作为判断三民主义“革命”与否与“新旧”与否之重要标准。

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阐释的三民主义理论之最大不满，是蒋介石仅凭孙中山思想中的唯心观点和消极因素，作为其建立独裁统治的意识形态支援，而无视乃至放弃孙中山思想中的革命因素和进步因素，尤其是放弃孙中山晚年所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这样解释的蒋记三民主义，显然带有法西斯主义毒素。周恩来严厉批评道：“从蒋介石这一切思想体系中，我们只能看出中国法西斯主义，决看不出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孙中山的思想中的唯心观点、消极因素，被蒋介石拿来发展成为他今天的思想体系；但孙中山的思想中还有某些合理的因素，更多的革命观点，尤其是在他晚年接近了共产党，采取了俄国革命的某些办法后，他的三民主义便成为革命的三民主义了。而蒋介石主义，却是另有一套东西，只能称其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③

由此，中国共产党重申：“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半殖民地的中国的民族解放的与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它要求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实行民族之独立与解放，这就是它的民族主义，它要推翻封建制度实行民主政治，这就是它的民权主义，它要求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这就是它的民生主义。”故孙中山的革命之三民主义与中共的民主革命纲领是相似的：“三民主义是中国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中的纲领，三民主义当作纲领与马列主义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纲领（共产党的最低限度纲领）在其主要的基本的口号与要求上没有冲突，而是一般的一致。正因为如此，中国的马列主义者认为实现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所必需，认为三民主义是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共同纲领，和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正因为如此，所以号召全中国人民为实现三民主义共和国而奋斗。”^④中共同时申明，他们鄙视把他们的立场与意见隐蔽起来，而是公开表示：作为共产主义的信徒，他们在同意、拥护并遵守三民主义原则的同时，绝不会因为任何原因而一时一刻放弃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故强调说：“我们共产党人所拥护的三民主义历来同我们根据马列主义立场而提出的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政治纲领是不相违反的。我们共产党人所拥护的三民主义，均明确的具体的规定于一定的革命的共同政治纲领上。我们共产党人为三民主义而奋斗，即是为这类共同的政治纲领而奋斗。”^⑤

实际上，中国共产党的这些基本原则在抗战之初已经公开宣示于天下，不仅其赞同三民主义的态度非常坦然，而且在理论上也是自洽的。但国民党顽固派及部分党外人士对于中共愿意实行

①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6页。

②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67—368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周恩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上卷，第150页。

④ 王稼祥：《关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解放》1939年第86期。

⑤ 洛甫：《拥护真三民主义，反对假三民主义》，《解放》1939年第81期。

三民主义颇觉惊奇，并断言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不能并存而怀疑中共的政治保证。毛泽东对此进行严厉批评并继续解释说：“这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观察。共产主义是在革命发展的将来阶段实行的，共产主义者在现在阶段并不梦想实行共产主义，而是要实行历史规定的民族革命主义和民主革命主义，这是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根本理由。”^①

三 从新三民主义到新民主主义：构建新的民主革命话语及其理论

中共在抗战之初承诺“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的本意，是为了实现国共合作，是用孙中山的革命之三民主义来实现其所主张的民主革命纲领，因为它与中共的民主革命纲领是相似的。但问题的复杂性显然超出了中共的预料，因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毕竟是他所创建的国民党之革命理论，是国民党政府正统地位与法统命脉之所在，故中共仅仅在国民党“三民主义”话语中阐述自己关于中国民主革命之政纲，不仅不能理直气壮，而且容易引起误解。即便中共提出并使用“真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阐释自己的民主革命政纲，也同样存在较大局限。这是因为，从根本上来说，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毕竟是中国两个不同阶级的意识形态，利用“三民主义”话语不仅不能很好地表达中共的民主革命目标和行动纲领，还有可能造成自身阶级性和革命目的性之模糊；不仅带来党内同志的思想疑惑，而且会给国民党顽固派提供攻击中共及共产主义的借口。实际上，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顽固派借解释三民主义而压迫中共放弃共产主义，就是利用了中共对三民主义所作出的政治保证而挑起的。所以，毛泽东告诫全党：“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小资产阶级性的三民主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主要政纲与我党相同，但整个革命全部纲领与我党纲领则不相同。”^② 还强调：“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上，国民党的这些纲领，同我们的纲领是基本上相同的；但国民党的思想体系，则和共产党的思想体系绝不相同。我们所应该实行的，仅仅是这些民主革命的共同纲领，而绝不是国民党的思想体系。”^③ 正因国共两党的革命纲领分属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中共就不能仅仅局限于“三民主义”话语体系中阐发自己的革命纲领，而要着力考虑建立自己独立的民主革命话语体系，以便更准确、更彻底地阐发自己的民主革命理论。

正是在与国民党进行三民主义问题论争中，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中共必须摆脱国民党的“三民主义”话语，构建自己独立的民主革命话语体系。1939年底至1940年初，毛泽东先后撰写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尝试放弃包括“真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在内的国民党之“三民主义”话语，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新概念、新范畴和新命题，独立自主地建构起“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第一次正式使用“新民主主义”的新概念，并明确地将中国民主革命分为新旧两大阶段，现阶段的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他指出：“现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已经过时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正在中国和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发展起来，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革命。”^④ 这种“新民主主义”就是此前中共反复阐释的革命之“新三民主义”；这种“新民主主义革命”实际上就是此前中共反复强调的实行“三

①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8—649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中卷，第134页。

③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52页。

④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7页。

大政策”之“新三民主义”革命。很显然，毛泽东开始以“新民主主义”一词替代此前所使用的“真的三民主义”或“新三民主义”概念，自觉地建构起关于“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理论。

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讲演中，接续《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将三民主义分为旧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的观点，并仍将是否包括“三大政策”作为划分标志：新三民主义“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没有三大政策，或三大政策缺一，在新时期中，就都是伪三民主义，或半三民主义”^①。唯有包括“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才是真正革命的三民主义。只有这种新三民主义才为“中国今日革命之必需”，中共才宣布“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可见，毛泽东对“新三民主义”内涵作了非常深刻的理论阐释。

为了摆脱国民党的“三民主义”话语体系、构建中共自己独立的民主革命话语，毛泽东在这篇讲演中正式用“新民主主义”一词指代“新三民主义”概念，相继使用了诸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新民主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政治”“新民主主义经济”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等新概念，围绕“新民主主义”这个核心概念，初步构建了一套关于“新民主主义”话语体系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如在讨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历程时，毛泽东将中国民主革命分为两个时期，其标志是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这之前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在这之后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阶段“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②。中共所要建立的“民主共和国”，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也就是真正具有革命意义的包含“三大政策”在内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③从此以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开始广泛使用“新民主主义”概念替代此前所使用的“新三民主义”概念。如毛泽东在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发表《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指出：我们现在要的民主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④。

总之，从真假三民主义到新旧三民主义，从新三民主义到新民主主义，中国共产党完成了对孙中山“三民主义”话语的重构。中共最初依据对“三民主义”之言行是否相符及内容是否被曲解，将其分为“真假三民主义”；随后以国民党“一大”宣言为标志，将是否包括“三大政策”为标准，将其分为“新旧三民主义”；明确宣称“中国今日革命之必需”及中共“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的三民主义是包括“三大政策”在内的“新三民主义”。随后，毛泽东和中共出于摆脱国民党“三民主义”话语、构建自己独立的民主革命话语之政治考量，从阐释“新三民主义”进至阐释“新民主主义”，用新创立的“新民主主义”一词取代自己所理解并在较长时间内使用的“新三民主义”概念，逐渐建构起一套“新民主主义”话语体系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中国历史研究院左玉河工作室）

本文责编：程方勇

①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90页。

②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72页。

③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75页。

④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25—733页。